

宗教學、宗教傳統、宗教團體 三者的順序問題

房志榮¹

本文是作者應輔大宗教系之邀，在「宗教學與宗教傳統」學術研討會「綜合座談」中做引言人時的發言稿。作者以基督宗教的發展歷史為例，強調活的宗教團體是宗教傳統的根基。以天主教的角度來說，基督宗教經歷過三大轉捩點：耶穌、君士坦丁大帝，和教宗若望廿三世。梵二是第三次轉捩點上的最重要事件，也是歷史上第一次參與者包括了東方、西方、北方、南方的全體主教，真真實實是世界性的大公會議，並引導出有極大發展潛能的「共融教會學」，重視多樣中有合一，進而開啓宗教交談的新紀元。

前 言

輔仁大學宗教系主辦這次以「宗教學與宗教傳統」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，在「徵稿說明」及「綜合座談」引介裡，三次提到「宗教團體」四個字。這引發了我這次引言的主題，要談談宗教學、宗教傳統、宗教團體三者的順序，即孰先孰後的問題。我是從天主教的實際經驗來談，提供給以下的座談當作參考。在此願開門見山、即刻點明三者的順序是：先有團體，後有傳統，最後才是宗教學的辨別與整理。

¹ 本文作者：房志榮神父，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博士，前耶穌會中華省會長，在本神學院任教聖經課程數十年，並曾擔任院長職務多年，文字作品很多，涉及面廣泛。

一、基督教由活的團體建立、傳開

基督教的根是猶太傳統和宗教。猶太人的祖先，以色列人民在公元前十三世紀末葉，在西乃山領受十誡，與天主訂立盟約時，已經是以團體（百姓）的名義領受和訂立的，梅瑟只是一個中介²。以後十個多世紀的第一盟約（舊約），都是建立在這個信仰的團體上，有先知、司祭、國王三種職務的結構來維持、領導、服務這個團體，直至第二盟約（新約）的到來。

新約是以耶穌基督為樞紐。他在宣道以前，先召收了門徒，組成一個團體³，用三年的時間把他們培養成新約教會團體的基石。當耶穌和他們在一起時，他們尚未理會到這一重責大任，但聖神一降臨，他們便脫胎換骨，完全成了新人，由耶路撒冷開始，分散到四面八方，果然把耶穌的好消息傳到天涯海角了⁴。被人稱謂「聖神福音」的《宗徒大事錄》，主要就是擇要敘述福音的傳播與基督團體的建立同步進行。這些團體的特色是共同祈禱，一起作抉擇（選舉）（宗一 12~28），聽取訓誨，挨戶擘餅，財產共享，常讚頌天主（宗二 42~47），同心合意，田產房產悉歸公用，以大德能為主耶穌的復活作證（宗四 32~37）。

以上是耶路撒冷教會團體的素描。至於保祿所建立的團體，可由他寫的書信得知梗概。首先是安提約基亞，那真是一個傳福音的團體：許多人在此皈依信主，他們大方捐獻物資，救濟受飢荒的人（宗十一 22~30）。那裡有先知、教師，信衆受聖神領導，禁食祈禱，給巴爾納伯和保祿接手，派二人出去福傳（宗十三 1~3）。這是保祿首次出外傳教，由團體派遣。

² 參閱：出十九；廿四。

³ 參閱：谷一~三。

⁴ 參閱：宗一 8。

以後的兩次都是由安提約基雅出發，而在所到之處建立了教會團體，最有名的是格林多、斐理伯、厄弗所、得撒洛尼。十四封信除了三封牧函及《費肋孟書》以外，都是寫給教會團體的。

二、基督宗教靠傳統維持其生命力

耶穌的十二宗徒於主曆第一世紀末已全部過世，第二世紀就開始了教父的時代，先是希臘教父、也稱東方教父，後是拉丁教父、也稱西方教父。後者於主曆 636 年，即義濟道 (Isidore of Seville) 去世之年；前者於 749 年，即達瑪森 (John Damascene) 去世之年結束。這六百年間東西教父的數目不下數千人，他們都是理論純正、行為聖善、年代古老，又受教會認可推崇的傳統的接班人，把聖經的啓示注入希臘和拉丁文化中，既維護、推動了這些文化，又加以糾正和革新。據史學家的評斷，使希臘拉丁文化開花結果的不是各時代的帝王將相，而是這些東西方的教會作家。

「教父作品的搜集，從 392 年聖耶樂著作《聖教名人記》開始，以至現今，代不乏人。近代的米梟在巴黎出版希臘和拉丁教父文庫，1844~1855 年出版了 218 冊，共有 2614 位教父和教會作家的作品。希臘教父文庫，1857~1866 年出了 166 冊，共有八百教父和作家……他 (Jacques Paul Migue) 對學術界的貢獻，是全世各國莫可比擬的。⁵」

教父時代之末已開始了西方的中古世紀，共一千年之久（以 1492 發現新大陸為終點）。雖然一般知識界視中世紀為黑暗時代，但在教會的傳統上，卻是一個盛衰起伏、變化莫測的千年。首先是蠻族（日爾曼）的皈化（五~八世紀）奠定了中古時代後期歷史的基礎。十一~十三世紀是中古文明的極盛時

⁵ 呂穆迪譯，《宗徒時代的教父》（香港：真理學會，1957），2 頁。

期。教會統治著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，在一切文化領域起著領導作用；神職界的革新、宗教生活的奮進、十字軍東征、重要的傳教事業、神學的傑作、羅馬式及哥德式教堂的興建……這些都是西歐民族在教宗領導下的表現⁶。

十四～十五世紀是中古文化的衰落時期，而文藝復興就在這時期崛起，一直延伸到十六世紀。教會賴教宗、修會，特別是特利騰大公會議的共同努力，也開始自我整肅和革新。新大陸的發現及傳教事業的發達給教會開拓新領域。如果十六世紀是意大利人材輩出的時代，十七世紀就是法國和德國表現文藝復興成果的時機。直至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抬頭，人對世界有了新的觀念，無信仰的氣氛日增，逐步導向十九世紀的唯理派哲學和科學萬能的信念。

羅馬公教會在十八世紀，不像其他時期那樣有過不稱職，或過分干預俗務的教宗。十八世紀的七位教宗都熱心宣教，以超性眼光看事，努力維持信仰的完整。十九世紀出了偉大的教宗比約九世和良十三世，至於廿世紀的教宗都是世界偉人，而以目前的第 264 位伯鐸繼承人—若望保祿二世—為高峰。

在結束本段「基督宗教傳統」時，願引一篇《拉丁教父文庫》之中，萊林聖文生司鐸有關基督教義發展的文字作參考⁷：

基督教義的發展

在基督的教會裡，將沒有什麼教義的發展嗎？確實有，而且該有最大的進展。因為誰能那樣忌妒他人、仇視天主，而阻止教義發展呢？可是所謂教義的進展，而不是改變。「進展」

⁶ 參閱：穆啓蒙著、侯景文譯，《天主教史》卷二（台北：光啓，1995 四版二刷），2~4 頁。

⁷ 見：《拉丁教父文庫》第 50 冊，667~8 頁，「誦讀二：選讀萊林・聖文生第一訓誨」。

是說教義的每一點本身的擴張；而「改變」是指某一物從一物變成另一不同的物。

因此，理應有所進展，而且要有極大的進展：不論個人或團體、一位教友或整個教會都該在了解上、在知識與智慧上、隨著歲月與時代的演進而成長，就是在同一教義、同一意義和同一理論上發展。

屬靈的宗教要仿效身體發展的過程：人的身體雖然隨年齡而發育，每一部分都成長，但仍然是同一個身體。兒童期的花朵，與年老期的成熟，其間雖大有區別；但是到了老年的人和幼年時的他還是同一個人。同樣，每人的身高和外表儘管有變化，仍然是同一人性，是同一個人。乳嬰的肢體短小，青年的肢體壯大，卻是同樣的肢體。兒童有多少肢體，成人也有多少肢體；而且人體隨年齡所顯示的較為成熟的部分，早在胚胎期已經存在了。因此，老人身上並沒有新的部分，因為早已隱藏在兒童身上了。

無疑的，這便是進展的合理和正確的規則，是生長的準確與美妙程序：造物主的智慧在兒童身上所創始的或預先形成的肢體，在成人身上會與年齡同時成長。假設人的面貌發生變化，或者在肢體上如果有什麼增損，全身必會死亡或變成奇形怪狀，或至少變得衰弱。同樣，基督教會的信理也該遵循這進展的規律，好使它隨著時代而增強，隨著歲月而發展，並隨著年齡而更高深。

我們的祖先古時曾在這教會的田地裡播下了信仰的麥種，我們作後代的若收穫錯誤的莠草，而不收穫真理的純麥，真太不應該、太不合理了。

相反的，那合理而適當的規則是：開始與終結不應該互相矛盾。我們種下了真理的麥種，就要收穫信理的麥穗。這樣，當我們看到開始所播的麥種逐漸成長時，現在便應感到愉快而加以耕耘。

三、宗教學可調整各宗教團體和傳統的步伐

啟蒙運動給基督宗教帶來很大的衝激，同時也開啟了多扇門戶，使它向外看。首先看到的是伊斯蘭教和猶太教，然後在亞、非、美各大洲看到印度教、佛教，和各種民間宗教。基督新教一方面，自從 1910 年 6 月在愛丁堡開過世界傳教會議(The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)後，於 1921 年在 Lake Mononk 成立了國際傳教議會 (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)。此一傳教議會於 1928 年的三、四月間在耶路撒冷開第二次會議時，討論的主題就是各傳教區的宗教(即伊斯蘭教、印度教、佛教)，而決議尊重並保留各宗教的優點。

天主教一方面，有的神學家認為基督宗教經歷過三大轉捩點：耶穌、君士坦丁大帝，和教宗若望廿三世⁸。耶穌用他的生活、死亡和復活打下基礎，他的門徒們把他傳揚開來：他確實是前無古人、後無來者的唯一天人之間的中保。人類歷史將以他的誕生來世作為分水嶺：公元前和公元後 (BC , AD) 。這一耶穌轉捩點有其延伸：基督徒團體越來越多，他們按照基督的精神塑造自己的生活，像耶穌一樣，不斷學習，不斷消化吸收。敬禮深受猶太傳統影響，用希臘哲學反省並系統化他們的神學，按照羅馬法搭成教會結構，吸取了許多日爾曼民族的熱心因素。

第二轉捩點當然不可與耶穌同日而語，但君士坦丁大帝體驗到 312 年的大勝馬森斯是來自基督徒所信奉的天主的大能力，而於 313 年宣佈《米蘭詔書》，給予全國人民信仰自由。這不僅讓天主教徒擺脫三百多年的教難和地窖生活而重見天

⁸ 見 Walbert Bühlmann, *Die Wende zu Gottes Weite-Welt-religionen fordern uns heraus*, M.-Grünewald Verlag, 1991, S. 10~14.

日，也是人類歷史的一塊重要里程碑⁹。從此，教會及其信徒在整個社會裡有了一個新的定位：名義、地盤，甚至特權隨之而來。基督徒為此一轉折喜不自勝，並為天主的眷顧高歌讚頌。但這一好運下，埋伏著一桌險棋：由第四世紀到廿世紀中葉這漫長的世代長河裡，固然不缺聖德、愛德，和文化的碩果，可是教會的重點已不知不覺在轉移：由被迫害者變成迫害他人的、由運動變為機構、由動態變靜態、由大公變小圈、由溫柔變強權、由「天主國」變「教會國」，福音轉為法律，喜訊變為恐嚇¹⁰。

第三轉捩點，是廿世紀中的教宗若望廿三世。1958年他當選教宗時，不少天主教人士感到失望，認為這樣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只不過是一個過渡教宗而已。結果他確實成了一位過渡者：藉梵二的召開，把教會由第二個千年過渡到第三個千年，為全球人類指出合一方向的慈善老人。這樣，結束了由君士坦丁大帝開始，經過中古時代，宗教改革，教會法庭，教會的絕對權威等老畫像，而起草了一幅新的教會畫像，這畫像是在第三個千年裡大家所追尋的。

梵二是天主教第廿一屆大公會議。前八屆大公會議是在東方開的，西方只有少數主教以客人身分與會。以後的十二屆都是在西方召開的，沒有一位東方主教參與。一直到梵二的召開（1962~1965），才有東方、西方、北方、南方的主教來與會。

⁹ 「《米蘭詔書》成了歷史上的里程碑。以前外教政府總以為自己為保護其權威，理應剷除妨礙其統治的信仰；那已是今日獨裁政府的觀念，視個人為服務國家的機械。藉《米蘭詔書》，國家元首首次公開承認：良心的領域超越一切人的權力以上，而單獨屬於天主。殉教的英豪，已贏得基督那句話的實現：『凱撒的歸凱撒，天主的歸天主』。」穆啓蒙編著，陳百希、侯景文合譯《天主教史》卷一（台北：光啓，1995四版），163頁。

¹⁰ 參閱 W. Bühlmann, op. Cit., 12 頁。

從前的大公會議，其實是西亞和歐洲的會議，梵二才真正是世界性的大公會議。可見梵二在世界史和教會史裡都有其非凡的意義。至於梵二文獻（四道憲章、九條法令、三個宣言）表達了這一大會的成果，近四十年來已發生很大影響，但大部分內容尚待繼續努力實現。與宗教學特別有關的，是《大公主義法令》、《信仰自由宣言》及《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》¹¹。

這三個文件是由《大公主義法令》開始，先談基督宗教的三大支流（天主教、東正教、基督新教）之間的合一；繼以《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》，說明基督宗教對其他世界宗教採取開放、信任，和對話的態度；最後是《信仰自由宣言》，論個人及團體在宗教事務上有權享有社會及公民的自由。三文件所說，直至今日還有領航作用，可以解釋為何梵二後的天主教和以往不同，變得更開放，更易與其他宗教，甚至與無信仰者交談、合作。這也是天主教傳統的一大特徵：大公會議發生著劃時代的作用¹²。

梵二以來，以天主聖三為楷模的「共融教會學」（ecclesiology of communion : koinonia）有很大的發展潛能：由基督宗教到其他宗教，再到整個人類，甚至受造界。其原因是共融的特質在於多樣中有合一：

「共融的教會學是教父非常熟悉的，而在公元最初幾

¹¹ 中譯文見《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》（中國〔台灣區〕主教團秘書處，1975年出版）。

¹² 《信仰自由宣言》的「註釋」中，不斷引用若望廿三世的《和平在地》通諭，也引用他的《慈母與導師》通諭，突顯這位教宗的新思維。《信仰自由宣言》多次提及政府的責任，在今天還有很現實的意義，如「政府應以公正的法律，及其他適宜的方法，有效的負起責任，保衛全體人民的信仰自由」（6號）。「但有些政權，在憲法上雖承認宗教信仰的自由，而政府卻在設法阻止人民的宗教信仰，並使宗教團體的生活陷於重重困難及危殆的境地」（15號）。

個世紀裡，是教會生活基本的因素。可惜較晚為畫一的『一體教會學』所籠罩而失色。廿世紀教父學的復興，讓人重新發現教會的古傳統，而導致教會學的革新，這一革新也影響了梵二大公會議。¹³」

結 語

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兩座110層的大樓數小時內全毀，華盛頓的五角大廈同日受到重創。事隔月餘，仍像吃了難消化的食物，胃中一直在翻騰：這怎麼可能？這如何解釋？科技文明發揮這樣的破壞力，難道與人心的裁決和判斷力無關？而人心是否又受到宗教的左右？各國政府和民間有不同的解讀。但不可否認的是，這次改寫東西方歷史的大災難，一定是與伊斯蘭教、猶太教，和基督宗教（特別是新教）及各教教徒對他們的信仰和教義所有的理解和釋義有密切的關係。

天主教方面，上自羅馬教宗，下至美國主教團及各信友團體，都以自省、悔改、祈禱、寬恕為解決糾紛之道。這也是在談宗教學與宗教傳統時，不可忽視的一面。

¹³ Cardinal Walter Kasper, "Theological and Spiritual Bases for Churches' Involvement in Councils of Churches", in *FABC Papers No. 99: Asian Movements for Christian Unity III, A Joint CCA-FABC Project: Giving Shape to a New Ecumenical Vision.* Chiangmai, Thailand, January 27-February 1, 2001, p. 25; D. Communion: Unity in Diversity.